

焦循戏剧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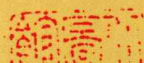
范春义 著

凤凰出版社

劇說卷一

江都焦循

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中得一快
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嘉慶乙丑養病
讀目取前快
云穀雨月記



焦循戏剧学研究

范春义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焦循戏剧学研究 / 范春义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6-1709-4

I. ①焦… II. ①范… III. ①古代戏曲—戏剧理论—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17151号

- | | |
|-----------|---|
| 书 名 | 焦循戏剧学研究 |
| 著 者 | 范春义 |
| 责 任 编 辑 | 林日波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 版 社 地 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 版 社 网 址 | http://www.fhcb.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22500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9.75 |
| 字 数 | 271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709-4 |
| 定 价 | 35.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4-85868858)

序

读罢范春义的《焦循戏剧学研究》，立时想到两句打油诗：“人间正道需好书，好书才见真功夫。”随着戏曲研究的深入发展，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的宏伟工程，至少已在研究领域的拓宽（诸如戏曲人类学、戏曲生态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经济学、戏曲观众学、戏曲心理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戏曲伦理学、戏曲传播学等多方面的探索，古今中外戏剧的比较贯通研究）、研究主题的纵深开掘（诸如曲话、选本、曲谱的研究，主脑、主旨、引线、本色、当行、境界、机趣、意趣、神色、收煞、腔格、气格、虚实、务头的探索）、研究方法的立体多元化（诸如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文本与文物的结合、文献整理与文本研究的结合、田野考察与观摩演出的结合、网络传播与舞台传播的结合等等）诸方面展示出丰硕成果。而所有这些中国戏剧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则是那些缺乏理论性系统论述而主要以资料汇编式的笔记为载体的文献。春义的《焦循戏剧学研究》正是对这方面亦即戏曲笔记研究的有所创见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对研究对象亦即焦循戏剧笔记的总体价值和基本定位比较准确。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三大戏剧体系之一且是综合艺术的我国古代戏剧，虽然源远流长，但是较之诗歌、散文的产生要晚，戏剧笔记较之狭义的文史笔记（不包括戏剧笔记）产生要晚，这些笔记考证赖以参考的文献的产生年代也就相对较晚。宋代印刷出版后的中国典籍尽管存在种种损毁情况，但是与唐代之前的文献损毁程度已经不能相提并论，因此，在考察戏曲笔记的辑佚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时，就不能估计过高。这是在对传统观念中戏曲本身价值和作用不能估价过高的前提下的必

然。古之曹丕的“经国大业”说，今之莫言的“文学大于政治”说，其实都是特定背景下的大话，都不如毛泽东的“螺丝钉”说准确。春义之所以论“焦循戏剧学背景”；考证《剧说》的版本和成书过程，辨析“点定”、“独撰”、“二次加工”三说，驳斥“压力说”；通过对《易余曲录》与《剧说》异文之比较、《曲考》与《剧说》剧目之比较，对《剧说》引用的二百多种文献缕分条理、辨析真伪、逐一考察，绝非仅是“知人论世”的必须，而是为焦循著作权正名的需要，同时也意在说明，焦循所引用的这二百余种文献，迄今绝大多数尚存，而且版本大都不止一种，这就势必修正某些研究者原先基于感觉而下的评价过高的结论。

其二，通过对焦循戏剧笔记基于特殊文化背景下提出的某些学术命题的丰富或者转换的深入研究，春义提出的一些观点可谓真知灼见，是为全书的闪光点。毋庸置疑，戏剧学笔记最重要的意义首先在于其资料价值。由于汇编了丰富的资料，多少能为其后的研究提供材料和线索。研究者一开始大都是从这个意义上利用这些戏剧学笔记的，但是现在学者的笔记研究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偏差，亦即在研究中，对于材料本体缺乏充分的关注，包括标点、引文，缺乏深入的研究，未能对其引文和其他资料逐一核实，也就很容易导致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结果，因而不能为以后的研究建构扎实的资料平台。由于对资料问题重视不够，有学者便转入戏剧学理论的探讨方面，而且大多从我国戏剧学的核心范畴入手，去探寻戏剧笔记作者在核心问题上的认识。例如去探讨语言的本色问题，抒情问题。这些问题确有研究的必要，但似乎不应该成为戏剧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理由很简单，古代戏剧笔记的作者很大一部分是业余票友，在类似问题的认识上未见得有多么高明，类似专业问题的最高明的答案应该在杰出的戏剧家、戏剧理论家那里。况且很多探讨的依据在于戏剧笔记所引用的前人的材料，一般作者往往只是表示同意而已，很少给戏剧学园地添加新的知识，实现知识的增长。所以，应该抛弃上述种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首先认真研究戏剧笔记作者基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提出的一些学术命题。这些命题或许前人已经关注过，但是在笔记作者那里有了丰富或是转换，如果这些命题产

生过重大影响那就更有价值。例如,春义对焦循《剧说》中所说“谬悠”与“求信”的出处和本意、焦循的丰富和转换、两者的对立和统一及焦循的戏曲虚实观与西方戏剧有关论述、与明清作者有关论述的比较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分析其理论的影响以及现实意义,从而对历史剧的二分法问题,得出了一些独特认识。他如关于“阴阳平衡”的词学观的问题,春义同样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给人启迪。

其三,通过对焦循戏剧笔记中反复出现的考证、引用材料的梳理、考证、辨析,对笔记作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溯源疏流,阐明隆替,揭示其本质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样显示了春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文献研究的功力。惟其在焦循戏剧笔记中这些考证引用材料反复出现,笔记作者又特别引以为趣,而且这些问题在历史上往往反复出现,甚至到现在还依然存在,因而类似问题的解决可以成为透视中国戏剧文化的重要窗口,也就是在戏剧笔记中出现的中国式戏剧学问题。诸如书中对于“讽刺”问题的考证与分析,对“一代有一代之所胜”问题的考索与辨析,都是引人注目的闪光点。因为类似问题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加之中国文化的传承性并未中断,对类似问题的研究也就颇有现实意义。可以说,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的辉煌工程乃是诸多子工程、个案研究的有机结合或曰集大成,《焦循戏剧学研究》就是为这一工程添砖加瓦的一个部分。春义治学重视文献考辨,为其研究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文献是学术研究深入展开的基础,离开了文献,研究会成为无本之木。文献除了全面,还要可靠,所以尤其要辨明伪书问题。春义考证了《剧说》等的成书过程、版本差异,澄清了由此产生的某些伪话题。对引文进行了细致梳理,澄清了基于感觉而下的关于引书的一些观点。为本书和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其义理阐释也能独辟蹊径,贯穿古今,适当联系中外,能够揭示焦循独特的戏剧学贡献及其戏剧笔记中的中国式戏剧学的本源问题。由于春义对上述问题有着自觉的方法意识,所以抓问题能够抓得准确,分析也比较深入,部分解决了中国戏剧学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不过,任何学术著作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书中对焦循《花部农

谭》的研究失之简略,不如对《剧说》的研究那样深入细致。焦循重视并且称道“花部”的通俗易懂的评论,在其《花部农谭》等著述中随处可见。当然,焦循是同意雅俗共赏的。他虽自幼居住在扬州郊区,喜爱观赏“花部”演出,但也听过昆曲,并肯定触动了他的情思,《雕菰集》卷五《听曲》诗云:“不惯温柔久断痴,红牙敲处亦相思。筵前多是悲歌客,只唱秋风易水辞。”而且还说昆曲有感人泪下的艺术魅力。焦循引用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说,万历之前,公侯、缙绅、富豪,凡有宴会、小集,都是演唱北曲。万历以后,则变而“尽用南唱”,在拍板、板鼓、洞箫、月琴的伴奏之下,“益为凄惨,听者殆欲堕泪”。对那些以昆曲演唱取得成功的剧作,例如梁辰鱼《浣纱记》,他曾给予高度评价。其《剧说》中引用《芳畲诗话》中的引诗云“彩毫吐艳曲,灿若春花开”,即为明证。焦循认为昆曲中也有不写“男女猥亵”的剧作,例如“《琵琶》、《杀狗》、《邯郸梦》、《一捧雪》”。他之所谓“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是对“花部”特点及功能的概括,并非等同于其全部戏曲标准的论述,他对昆曲抑或雅部没有排斥。对此,春义似可以论述的更为全面和深入一些。

十年之前,春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曲阜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笔者忝为导师。其时我严厉有加,而春义也自觉地奋发努力,使我颇觉欣慰。其硕士论文就是关于焦循的研究。毕业后,他考入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攻读博士,文献功底益发扎实。毕业之后的工作单位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又是专业的单位,所以春义能完成这样一部著作。春义做事胜于言辞,勤奋黾勉,相信他定能更上层楼,为戏曲研究作出更大贡献。是书业已杀青,春义问序于我,情理难却,聊作数言以为序。

徐振贵

2012年11月8日子夜于曲苑

从“没有理论”的戏剧学说起

——自序

对于戏剧学的研究对象，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目的，其界定各有千秋。如果不做偏执的理解，戏剧学研究应该包括与戏剧相关的所有内容，而不仅仅局限在学术界重点关注的戏剧史、戏剧理论、资料文献诸方面，固然三者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灿烂的戏剧文化肯定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实践的结果，而在中国传统的戏剧学文献中，却恰恰“没有理论”。正如齐如山先生所说：

无论想研究哪一门学问，总要找点书籍，倒是找到了二十几种，无非是《燕兰小谱》、《明僮录》等等这类的书，不过这些书，不但没有讲戏剧理论的，且没有讲戏班情形的，都是讲的相公堂子。如某人为某人之徒弟，隶某部，工某角，意思是搭某一班，工唱青衣或花旦之类，也有恭维各角的诗词等等，但所有恭维的词句，都是与恭维妓女的文字一样。总而言之离戏剧太远，这些书于研究戏剧，可以说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于是又设法找到几种。如焦循（字笠堂）《剧说》之类，我未见之先，私以为焦笠堂为经学大家，他的《剧说》必非《燕兰小谱》之类，及至看到，确也有点研究的性质，但总是偏重南北曲剧本的记载，关于理论的部分，还少得（原文作“的”）很。至于《度曲须知》，陶九成论曲，燕南芝庵论曲，周挺斋论曲，赵子昂论曲，丹丘先生论曲，涵虚子论曲，《录鬼簿》等等，虽然都是专门戏剧的书，但都是研究歌唱及记录曲中的情形，绝对没有谈到戏中之动作的，就是《扬州画舫录》等类的书，也就是记载当时的情

形,然更是似是而非。^①

而此类文献构成了传统戏剧学的主体,其主要内容见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中国戏曲研究院编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其内容“有的是关于古典戏曲的编剧、制曲、歌唱和表演等方面的理论;有的是关于戏曲源流的考察;有的则是作家、演员的传记和掌故、史料方面的记载。我国一千多年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的比较重要的戏曲理论方面的专著,目前能够搜集到的,大体都包括进去了”^②。傅谨先生评价到:“然而事实上,在这部书里,讨论国剧的曲调、声律的论著,占到了其中一大半,另外的一小半,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叙述涉及到国剧的缘起、发展和变化等不甚可靠的道听途说,更多的则是与剧作家、演员、乐师相关的趣闻、珍闻和轶事的笔记小说,或者类似的著述。”^③解玉峰先生《百年中国戏剧学刍议》对此也有集中总结:“中国古人并没有为今人传留下现成的概念范畴或理论体系,《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的古典戏曲‘论著’与今人所谓‘论著’其实有相当大的距离,《集成》所收四十八种‘论著’都仅仅是今人理解前人戏剧观念、勾勒戏剧历史时可供采集的‘原始资料’。”^④2009 年,黄山书社出版俞为民、孙蓉蓉主编的《历代曲话汇编》,在资料范围上有了进一步扩展,可谓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戏曲学资料汇编,但其内容多不出上述范围。

傅谨、解玉峰两位先生的概括非常准确,中国传统的戏剧学就是这么一类内容。问题是戏剧学的历史作为既定事实已经不能修改,那么,我们是抛开这些“事实”另起炉灶,还是就事论事,探寻适用于中国戏剧学的特定研究方法。答案很明确:二者是兼容关系而非排斥关系。就

① 《齐如山回忆录》,中国戏剧出版社,1998 年,页 87—88。

②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前记》,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年,第 1 册,页 1。

③ 《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页 327。

④ 《百年中国戏剧学刍议》,《文艺理论研究》,2006 年第 3 期,页 53。

前者而言,齐如山另起炉灶,“齐如山的诸多戏剧著作,不仅第一次较为详尽而且系统地记录了戏剧表演的基本格局,而且从中总结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揭示了中国戏剧从创作到演出一直遵循的戏剧学原理,由此中国戏剧才拥有了它的理论形态”^①。这是保证戏剧学学科在现代学术体制内生存的重要条件,许多学者正在进行不懈地耕耘。

现在第二条研究路径似乎不太景气,许多学者已经转移阵地,许多重要艺术学刊物的刊文数量也不乐观,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立项更是屈指可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由于文献资料匮乏和传统文献本身缺乏理论性,加之现代学者已经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再拓展的空间受到局限;另一方面就是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问题,主要表现在先用当代的戏剧学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畴作为预设,然后到传统戏剧学文献中寻找资料进行阐发证明。这保证了学科的合理性,然而其最大的弊端在于违背了从事实出发的基本学术要求,运用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的办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削足而适履,正如《淮南子·说林训》中所云:“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②削足而适履既然不可取,解决办法就是“就脚做鞋”,好好呵护中国戏曲学的“所养”。

从上世纪末开始,上述观念受到检讨,主张建立中国特色的戏剧学体系呼声日高。如徐振贵先生在《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一文中指出:

所谓“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中,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或者说关键词,应该是古代戏剧批评的总结和升华,并与今人的革新和创造相结合,而不是西方的、欧化的或者苏化的话语的生吞活剥、照搬照用。我国古代戏曲批评中,并没有悲剧、喜剧、现实主义、浪

① 《中国戏剧艺术论》,页328。

② 《淮南子集释》卷十七,中华书局,1998年版,页1180。

漫主义、矛盾冲突、人物形象、世界观、陌生化、间离效应等词语,这些外来观念的引入,的确产生过正与负两个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但是,如果仅仅以中国古代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实际来阐释这些词语,或者以这些概念来评论分析中国古代戏曲,总会觉得像是梳着清朝大辫子而非要穿着西装一样。而中国古代戏剧批评中,倒是出现过诸如主脑、主旨、引线、本色、当行、境界、机趣、意趣、神色、收煞、腔格、气格、虚实等概念,这都是中国古代戏曲创作和演出实践的结晶,今人应予以全面阐释、正确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升华、革新、创造。^①

就中国特色而言,除了在表述上建立中国的戏剧学话语之外,另一方面是发现和解决中国戏剧学中的“中国式问题”。什么是戏剧学中的“中国式问题”?即是在中国特定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学的学术问题。其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李昌集《王国维对元杂剧三点批评的当代解读——一个世纪学案的重新讨论》一文可谓是一个典型的个案研究。能够发现此类问题,首先从转换观念入手,抱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然后从事实本身入手,结合现代学术观念,进行阐发、引申,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完成新的理论建构。

古代的戏剧学文献,其著述体裁以笔记为主。对于其研究,可以分为事实研究层面和理论概括层面。就事实层面而言,一是关于书籍的作者、成书、版本、引用文献研究等传统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二是关于笔记中所涉事实本身的研究。尽管学术界已经有研究者关注这些问题,但是程度远远不够,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或是压根就没有注意到,导致一些似信非信的资料成为研究的重要证据。前者如关于徐渭《南词叙录》的真伪问题,就很值得讨论。后者如在《琵琶记》研究中,关于朱

^① 《建立健全我国话语的戏曲理论体系》,《光明日报》,2005年6月24日。

元璋推崇《琵琶记》并将其分发给诸王的记载被广为引用。此则材料除了见诸《闲居集·张小山小令后序》外,在官方文献以及诸王的记述中均未发现相关记载,其真实性能不令人怀疑。再如“明太祖禁歌舞”条:“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该条材料见于清人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二《历代》,也颇似小说家言,给人不必尽然,亦未必不然之感,总是令人感到有些不踏实。类似问题所在多有,均有深入求证的空间。理论阐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阐释笔记编纂者本人的戏剧学观念和思想。这些编纂者文化背景不同,身份不一,其间既可能存在千人一腔的陈词滥调,也可能存在来自异域视角的慧眼独具。二是阐释笔记中的中国式戏剧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加深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戏剧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中国文化未曾中断,很多探讨的问题对现在仍具启发意义。这样看来,类似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可能会远离戏剧本体研究,但我们不应忘记戏剧艺术是中国文化滋养下孕育出来的艺术奇葩,离开了大地的承载与滋养,其走向枯萎也在所难免。郭汉城在1993年提出:“中国戏曲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必须重视戏曲交叉学科的研究。因为有些理论上的重大问题,不是在本学科的范围內所能解决的……如戏剧人类学、戏曲生态学、戏曲社会学、戏曲经济学、戏曲观众学、戏曲心理学、戏曲民俗学、戏曲宗教学等等,都有广阔的天地有待我们去开拓、探索。”^①李昌集也指出:“戏剧史是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整合,而不单纯是若干戏剧家和剧本的‘思想’与‘艺术’的串连。”^②这些方法为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关键是要避免理论与事实脱节,只有将其水到渠成地运用到戏曲研究中才能最终解决问题。80年代“方法论”时代的文学研究中,西方理论加中国事实的学术生产模式导致产生学术泡沫

① 《戏曲史论丛书》序言,见刘彦君《栏杆拍遍——古代剧作家心路》,文化艺术出版社,1995年,页3。

② 《中国古代曲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698。

的教训应该引起研究者的警醒。

基于上述想法,笔者选择焦循戏剧学研究,还原其研究的背景,发现其独特的合乎客观事实的戏剧学观点,找出其关注的历代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一方面可以丰富学界对中国古代戏剧学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本思想指导下的个案进行研究尝试,成败与否均可提供经验或是教训。书海无涯,穷毕生未得其万一;学养所限,时或郢书而燕说。书中存在的问题,独任其咎,欢迎同行绳正之。

范春义

2012年10月于临汾

目 录

序	徐振贵(1)
从“没有理论”的戏剧学说起	(1)
绪 论	(1)
第一章 焦循的戏剧学背景	(11)
第一节 焦循的家世、经历与戏曲交游	(11)
第二节 戏曲环境与文献环境	(24)
第三节 考证的生活化	(42)
第二章 《剧说》的版本与成书	(52)
第一节 《剧说》的版本及其存在的问题	(52)
第二节 《剧说》的著作权问题	(75)
第三节 《剧说》的编写体例与修改	(102)
第三章 《剧说》的文献与内容	(114)
第一节 《剧说》的资料来源	(114)
第二节 《剧说》的内容述略	(146)
第三节 《剧说》存在的问题及其文献价值重估	(153)
第四节 《剧说》的戏剧学文献风貌成因	(167)

第四章 《花部农谭》研究	(174)
第一节 《花部农谭》的成书、传播及价值	(174)
第二节 《花部农谭序》所涉艺人考略	(181)
第五章 焦循的思想与戏剧学	(186)
第一节 焦循的戏剧定位及戏剧功能观	(186)
第二节 焦循的历史剧改编思想	(196)
第三节 “一代有一代之所胜”问题研究	(209)
第六章 戏剧文化现象研究	(222)
第一节 王四到底冤不冤	(222)
第二节 公宴选剧何以最难	(249)
第三节 真刀、大棒及其他	(265)
第四节 情之多维体验：马伶、商小娥、俞江女	(273)
小 结	(283)
参考文献	(286)
附录 焦循散见戏剧学资料辑佚	(293)
后 记	(298)

绪 论

引 言

焦循(1763—1820),字里堂,江苏扬州江都(后划归甘泉,今属邗江区)人。乾嘉之际扬州学派著名学者,在经学、算学、方志学、小学各领域均有建树。焦循作为扬州学派的中坚学者,在学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阮元在《通儒扬州焦君传》中,对焦循的经历和学术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小有足疾,遂托疾居黄珏桥村舍,闭户著书,葺其老屋曰半九书塾。复构一楼,曰雕菰楼,有湖光山色之胜,而读书著书恒在楼,足不入城市者十余年矣。……得年五十有八。……博闻强记,识力精卓,于学无所不通。著书数百卷,尤邃于经。于经无所不治,而于《周易》、《孟子》,专勒成书。……君性诚笃直朴,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禄。居恒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书为事,湖山为娱。壮年即名重海内,先辈中如钱辛楣、王西庄、程易田诸先生皆推敬之。煦斋先生见君《易》学,叙之,以为‘发千古未发之蕴’,且集苏文忠句书赠之,曰:‘手植数松今偃盖,梦吞三画旧通灵。’子廷琥,能读父书,传父学,端士也。……焦君与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与元齐名。自元服官后,君学乃精深博大,远迈于元矣。今君虽殁,而学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综其学之大指而为之传,且名之为‘通儒’。谥之史馆之传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遗也?’”^①《清史稿·儒林传》中采用了这一评价,并补充评论曰:“歿后,阮元作传,称其学‘精深博大,名曰通儒’,世谓不愧云。”^②

① 《雕菰集》卷首《通儒扬州焦君传》,刘建臻点校《焦循诗文集》,广陵书社,2009年,页6—11。

②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二《儒林传》,中华书局,1977年,页13258。

作为业余爱好,焦循的戏剧研究著作主要以笔记为主,《剧说》、《花部农谭》、《易余曲录》、《曲考》四种著述构成了其戏剧研究的全貌。鉴于焦循的巨大成就和影响,20 世纪的焦循研究首先从其经学开始。随着戏剧学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焦循戏剧学研究日益受到学界关注。戏剧学研究只是焦循的业余研究,其注重点在于经学。要想完整且客观地认识焦循的戏剧学,应该本着“知人论世”的基本学术路径,在宏观的视野下才能获得更加清晰的认知,亦即王国维所提倡的“观其会通,窥其奥窔”,否则就可能出现“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

一 关于 20 世纪以来焦循戏剧学的外围研究

就焦循戏剧学的外围研究而言,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焦循的年谱、学谱、评传,为认识焦循的人生履历、思想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事实材料。焦循传记年谱材料,最原始者即为阮元所撰《通儒扬州焦君传》及焦循之子焦廷琥所著《先府君事略》,成为其后研究焦循履历的蓝本。民国时期,出现了王永祥《焦里堂先生年谱》^①、范耕研《江都焦理堂先生年表》^②;建国后,有戴培之《江都焦里堂先生年表》^③。1994 年,台北里仁书局出版赖贵三《焦循年谱新编》一书,成为迄今为止焦循年谱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以前焦循年谱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相关材料,基本复原了焦循的生平事迹。有的时间段因为材料丰富细致,甚至可精确到以天为单位。书前楔子《扬州北湖焦氏世系记》,考察了焦氏的家族世系。正文分五章:第一章“启蒙就学期(1—20 岁)”;第二章“村居授徒期(21—30 岁)”;第三章“游幕教授期(31—40 岁)”;第四章“家居

① 《焦里堂先生年谱》,《东北丛刊》第十三期,1931 年 1 月。

② 《江都焦理堂先生年表》,《斯文》第一卷第 17、18、20 期,1941 年 6、7 月。

③ 《江都焦里堂先生年表》,台湾师范大学《师大学报》第 2 期,1957 年 6 月。
按:本节关于焦循早期研究状况的回顾参考了陈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的相关成果。